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著
- 陈郁 郭宇峰 汪春译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

——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F-019.6

3

WU JING JI JI 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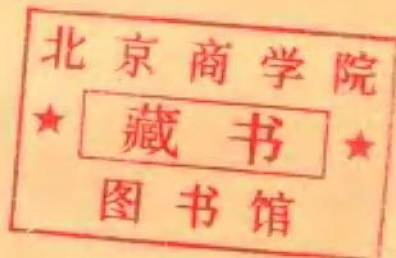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

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 [德] 韦伯·W. 著 阎利军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公共政策理论



(沪)新登字101号

Daniel W. Bromle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
Basil Blackwell Inc., New York, 1989
经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公司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施宏俊
封面装帧 宋珍妮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
——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美] 丹尼尔·W. 布罗姆利著
陈郁 郭宇峰 汪春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24,000

印数: 1—5,000

ISBN 7-208-02368-9/F·488

定价: 18.00 元

5A48/06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丹尼尔·W. 布罗姆利 (Daniel W. Bromley, 1940 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系环境研究所执行主任和安德森-巴斯肯讲座教授, 1981—1986 年为该系系主任, 自 1974 年以来一直是该校《土地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还是环境和资源经济学家联合会的理事,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

布罗姆利教授擅长的是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环境问题方面的研究, 并较为注重公共政策的制订问题, 因此, 他曾受聘于美国政府、一些国际组织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具体说来: 1973—1974 年, 在美国内政部和国际开发署做访问学者, 另外, 担任过许多机构的顾问, 如美国水

源委员会、国家水质委员会、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Aga Khan 基金会、新西兰环境部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他还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多米尼加、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危地马拉、巴拿马、巴西、海地、印度和苏丹等发展中国家一些组织和机构的顾问。

1986—1987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布罗姆利教授写下了我们翻译的这本书:《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该书于 1989 年由英国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公司出版。这以后他还出版了《环境与经济:财产权利与公共政策》(1991)和《公共事务决策:理论、实践与政策》(主编,1992)。

二

在本书中,布罗姆利教授为了分析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首先对流行的有关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考察,其中主要是科斯、德姆塞茨和波斯纳的私有产权观、宾斯旺格、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以及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他认为,这些模型侧重于效率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种同义反复(tautological),因此它们均错误地界定了制度变迁的源泉。

布罗姆利教授认为,制度决定了个人的选择集,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仅仅是被界定在选择集中的一种最大化选择。效率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假定下的一种人为的东西(artifact)。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更大程度上是国家对个人的强制,或者是那些能使国家为其所用的人对他人的强制。市场效率是

不考虑强制的。从逻辑上讲,对制度安排的偏好比起对制度安排的结果的偏好更重要。经济学家通常的做法是,视现存的制度以及对这些制度的偏好为既定,由此寻求受此限制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但是,人们对于制度安排是有偏好的,就像他们对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作出的选择有偏好一样。

根基于对流行观点的批评,布罗姆利教授塑造了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的模型,在此模型中他引进了制度交易(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s)概念。这一概念表示一种对制度安排进行选择的经济行为。他指出存在如下四种制度交易:(1)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的制度交易;(2)有目的地改变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3)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交易;(4)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在福利经济学范围内,人们对前两种制度交易已经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一派强调生产效率,一派强调收入公平分配。布罗姆利教授着重分析的是后两种制度交易。在他看来,公共政策是有关制度交易的,尤其是后两种制度交易。这两种制度交易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为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分歧。由此,布罗姆利教授将公共政策问题与制度交易或制度变迁问题联系了起来。公共经济政策及其决定亦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变量。

那么,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中乃至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地位怎样?如何行事?这样的问题很少见诸于经济学家的著述中,而布罗姆利教授在本书中专辟有关方法论的一篇,特意加以讨论。简言之,从方法论上讲,客观性并不是科学本身的特征,而是经济学家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特征。过去由于一直为所谓的客观的经济效率这一习惯性偏见所误导,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中只起有限的作用。一旦抛弃传统的偏

见,经济学家必将在公共政策领域乃至制度变迁中一显身手。

三

纵观全书,布罗姆利教授对基于效率观的制度变迁模型提出了批评。在行文措词上,他还是较为平和的,仅仅指出这种模型只不过是种同义反复。不过,其言下之意却很深刻:市场不是万能的,有时它解决不了问题。

几十年以来,布罗姆利教授一直是《经济问题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的撰稿人。这本杂志被视为是继承约翰·康芒斯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阵地。因此,布罗姆利教授也可归为这一派经济学家。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这一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也冠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那一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当我们也意识到某些事情属于市场不能完成的事情而需要通过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来完成时,读一读布罗姆利教授的这本书大有裨益。我想,这一天很快会到来(或已经到来)。

再者,撇开学术门派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市场的作用之类问题不谈,布罗姆利教授这本书亦被认为是将公共政策、经济制度的作用以及用经济理论来理解和说明制度变迁等问题溶于一炉,并且本书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摆脱了逻辑上同义反复的传统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我们翻译本书的初衷。

四

本书的中译本序、鸣谢、第 5 和第 7 章由陈郁翻译,第 3、第 4 和第 6 章由郭宇峰翻译,第 8 和第 9 章由汪春翻译,第 1 和第 2 章由汪春初译并分别由陈郁和郭宇峰复译。全部译稿完成后,陈郁校订了第 1、第 2、第 3、第 4 和第 6 章,郭宇峰校订了第 8 和第 9 章。

原著者布罗姆利教授对我们工作的赞赏和鼓励及寄来的大量文献资料使我们在理解、翻译原著时获益匪浅,英国巴西尔·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负责涉外版权的斯特拉·韦尔福德(Stella Welford)先生对授予我们中文版权提供了方便,陈昕同志始终如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何元龙先生做了不少出版方面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译稿几年前业已完成,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出书,虽略有遗憾,但这也给译者多了一次改正若干翻译不当之处的机会。尽管如此,受学识所限,译文中依然存在有待改正之处,望读者指出。

陈 郁

1996 年 5 月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个人行为形成一个激励集，由此鼓励发明、创新和勤奋以及对别人的信赖并与别人进行合作。通过这些激励，每个人都将受到鼓舞而去从事那些对他们是良有益处的经济活动，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个人只不过是社会的一部分。尽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设计这些激励机制，但基本的经济问题仍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社会能长期将那种不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付诸实施。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必然优于所有个人的总体利益。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如果能找到办法鼓励个人去勤奋工作，去从事生产性活动，以及长期保持清醒的头脑来进行经济决策，那么集体利益很可能得到增加。

依我之见，激励就构成了本书所关注的经济制度。我将本书明确取名为《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这是因为：个人和集团有着他们希冀实现的经济利益，并且由此通过集体行动形成制度安排，他们确信这些制度安排将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利益。我希望读者领悟到：经济学是研究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如何决定了我们周围的经济体制的性质的。

或许，中国读者会被大量有关“效率”的同义反复的文献所困扰。让我对此作一个简要的解释。西方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它既定义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同样用这个框架判定资源的某种具体配置是有“效率”的。不幸的是，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到：说某一种具体配置是有“效率”的，这是很不严谨的，因为存在许多如此这般有效的资源配置。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得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他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尽管亚当·斯密对激励的重要性作了辉煌灿烂的论述，但是作为一位道德哲学家，他对社会进一步走向美好却忧心忡忡。许多迷恋于斯密的机械式的最大化过程的西方经济学家勉勉强强地承认，考察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各不相同的累积，经济科学具有深刻的洞察力。

有人告诉我，《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毋宁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非常强调经济的制度结构方面——意味着制度安排决定个人选择的领域和范围。我对此表示赞同，并感到欣慰，事实上，我的分析包容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观点。斯密给予激励在经济体制中的卓越的、重大的作用，或许他对谁控制经济剩余甚不关心。在斯密著书立说的时代（18世纪末），

经济活动一般是在飞扬跋扈的君王、自私伪善的教会和妄自尊大的土地领主严格控制下的。斯密的任务是使胆怯者确信，在经济事务中，个人的选择将增加所有人的收益。更率直地说，带来晚餐桌上的感恩和光明的并不是屠夫、面包师或蜡匠的善行，而正是每一个工匠个人的自我利益确保了我們社会未来的兴旺发达。

对斯密来说，他发现了激励的秘密所在，即激励因素引发了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经济行为。亚当·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卡尔·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通过对英国的考察，马克思对产业革命的不良后果（斯密之后的大约 100 年）深恶痛绝。他一直告诫我们，无视财富的极端分配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暴力革命。尽管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重要性的见解是正确的，但他似乎对生产的激励甚不关心。

在此，我的目标是要强调问题的基本方面——它常常为西方经济学家所遗漏，即：市场有其自身的机理，它会产生一些有“效率”的后果，这些后果对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和可怕的——饥馑、流离失所、绝望、失业、吸毒和无以言表的犯罪。与此同时，我希望生活在其他制度下的经济学家领悟到，激励因素——制度安排——必须作为基本的政策变量来看待，必须牢记可对此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不受限制的市场可以低成本生产一定的物品和服务，但市场在完成这种任务的同时并不考虑某些真实的成本，这种成本不反映在价格计算上——环境污染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与此同时，中央统制经济似乎避免了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个人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误用，但是

由于对个人缺乏激励可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对人们来说是重要的一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被束之高阁。

我希望,《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能被当作人类社会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the post-ideological era)的一本书来读。正如市场导向经济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来完成市场不能完成的事情,中央统制经济似乎也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扩大个人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的权利和行动范围。近来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显然就属此列。

人类的生存条件——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我殷切希望,就像不再把军事方式作为解决国际间争端的主要形式一样——我确信朝这一方向迈进是大有前途的——我们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而集中于人类大家庭的团结。人类所孜孜以求的是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生活得美好和舒适。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物质环境是鼓舞人心的,而不是充满毒害和重压的;我们期待的政治体制是解放人类精神的,而不是控制和压迫人类精神的;我们渴望的文明生活是向上的,而不是后退的;我们探寻的经济体制是鼓励个人的发明创造,但保护——由于生不逢时、能力有限、意外悲剧和在别人经济控制下的——落伍者的。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我希望本书揭示了这个过程。

末了,我希望借此对陈郁先生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他对

翻译本书这项最为困难的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我深知,即使对那些母语是英语和完全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来说,本书常常也是很深奥的。我无法想象将本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碰到多么大的困难,尤其是书中的许多概念很可能不是中国经济学家所惯用的专业语言。陈郁先生以智慧、见识和耐心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正表现出个人精神的力量和人们对新思想、新概念的渴望。人类历史滚滚向前正是来源于对新思想的信奉——陈先生在此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深知,未来将比过去更美好。

丹尼尔·W. 布罗姆利

1992年11月3日于麦迪逊

鸣 谢

工作环境给予人的启迪,即使不能超过某些个人的影响,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的。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分别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剑桥沃尔夫森学院和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度过了一年。在那里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这份美差激发了我对经济利益和制度进行思考,这是任何其他职位不能比拟的。在培根、牛顿、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逊、斯拉法、多布和卡尔多——只列几个最辉煌的名字——曾经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地方漫步和写作,这一点足以使人潜心工作。然而面对剑桥校园令人赞叹、无与伦比的优美环境和氛围,要做到凝神静思又确实颇为不易。我将永远感谢沃尔夫森学院院长戴维·威廉姆斯和土地经济系教授戈登·卡梅隆。我

也要感谢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列奥·沃尔士给了我假期，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和研究生院也给我提供了额外的资助，使我得以实现剑桥之行。

然而，灵感的真正源泉是思想。在这里总是有同事来指教我，并对我的文章作出改进。我的朋友艾伦·施密德对经济过程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我以前的导师艾默里·N. 卡斯尔对学术的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我最近的导师、剑桥克莱尔学院受人敬重的 R. C. O. 马修斯更使我获益匪浅。在我被自我怀疑困扰时，是他主持的关于制度经济学的研讨班给了我必要的动力。

还有一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审阅了本书的初稿。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克里斯托夫·巴登尔特、保罗·巴克利、约翰·布拉顿、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罗桑、弗农·拉坦和冈特·施密特。有几个章节受到了理查德·毕晓普、布鲁斯·考德威尔、迈克尔·卡特、邦尼·考比、亚历山大·费尔德、戴尔沃斯·加德纳、亨利·汉斯曼、伊恩·霍奇、克里斯·纳恩、凯瑟琳·西格森和哈罗德·冯·威茨格等人评论的启发。

最后，在我所有这些努力中，有两个人是必须特别提及的。她们给了我无私的巨大帮助。我的秘书玛丽·J. 约翰逊把我的一团乱麻般的原稿整理出来，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任务上。她的帮助和奉献是无人能够替代的。我的妻子乔伊斯是我取之不竭的源泉。从她那里，我不断汲取到力量、快乐、建议和营养。她对我的贡献——以及对学术的追求——总是在我遇到难题时催我向前。没有她，我将一事无成。

丹尼尔·W. 布罗姆利

于麦迪逊